

经济全球化的新态势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变革

胡 键

摘 要：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态势表现为全球产业链的重组、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全球供应链的重塑。新态势下，传统的全球经济治理公共产品的功效受到普遍性怀疑，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正在取代过去各种区域或跨区域层次的自贸区，全球经济治理的新兴领域不断涌现，因此全球经济治理也必然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新变化而进行新的变革。全球经济治理变革受诸多因素的制约而举步维艰，如果从全球经济治理的顶层行为问题入手，首先解决全球公共产品的公正性、全球经济治理的持续收益性、行为主体的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制度的协调性问题，其他具体的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尽管全球经济治理变革困难重重，但从理想主义的观点看，全球经济治理走向善治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全球经济治理；世界大变局；全球善治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 (2022) 08-0101-14

DOI:10.13687/j.cnki.gjmts.20220816.004

如果从资本开拓世界市场算起，那么经济全球化已经有约五百年的历史；如果从20世纪70年代经济全球化这个概念正式使用开始算起，那么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也有大约五十年的时光了。即便考察这约五十年的时光，经济全球化的内涵和表现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这近五十年来，不仅有冷战的结束和两极格局的崩塌，而且两极格局之下的“两个平行的市场体系”也迅速被全球统一的大市场所取代，尤其是中国不仅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且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众多东欧国家以及相当一部分苏联加盟共和国独立以后，也都纷纷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从而“形成了统一的市场规则，促进了全球经济体系内的国家充分竞争合作”（陈伟光、刘彬，2020），这一切已经相当大程度上改变了经济全球化的内涵。而冷战结束后，国际权力的加速转移，同时，外在人类文明的“异类文明”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巨大冲击（即已经延续三年之久的新冠肺炎疫情）^①，则对经济全球化内容的根本改变起了加速器的作用。全球经济治理是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社会理性行为，在经济全球化内容根本改变和经济全球化新的态势之下，全球经济治理无论是治理的理念（价值诉求）、对象、手段等都必须改变。简言之，经济全球化的新态势必然引发全球经济治理的嬗变。当然，在冷战结束之前的经济

收稿日期：2022-05-3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ZD061）

作者简介：胡键（1968-），湖南道县人，上海政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经济。

全球化不是“全球性”的，全球经济治理也不是“全球性”的，有学者称之为“半球治理”（陈伟光 等，2022）。这虽不是规范性的表达，但也的确概括了全球经济治理的客观事实。

一、世界大变局下经济全球化的新态势

当代世界中的经济全球化既是世界大变局的一种表现，又是世界大变局的一个结果。之所以说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大变局的一种表现，是因为经济全球化的重大变化正是世界大变局的一个重要内容。经济全球化的重大变化表现为：一是与此前任何时期相比，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影响的范围更大、程度更深。从范围来看，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经济体能够绕过经济全球化而独自前行，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之下，既没有人是一个孤岛，也没有一个经济体在孤岛之中能够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影响的程度来看，世界各个经济体都因经济全球化而相互依赖、相互嵌入，这种状况也超出了历史任何时期。之所以说经济全球化又是世界大变局的结果，是因为世界大变局最重要的是国际权力的转移，这也就意味着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在变化，因而经济全球化本身也必然随之而变化。无论是作为世界大变局的表现还是结果，经济全球化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态势，其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全球产业链正在重组。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西方工业大国在技术的助推之下产业在升级换代，传统制造业纷纷转移出来，而承接这些产业的主要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正在此时推行改革开放的中国，加之中国劳动力富余。因此，中国从那时候开始发展成为传统制造业大国，在 20 世纪最后的二十年中，以“中国制造”的传统制造业成为全球最有影响的重要产业。不过，“中国制造”包含了“在中国制造”和“由中国制造”两大部分，所以“中国制造”并非是从源头到产品都是中国制造，相当一大部分生产属于全球产业链上的一个环节，但其重要环节或者是产品的最终环节在中国，于是都被赋予“中国制造”之名。从这一点来看，中国在传统制造业的全球产业链中处于中心位置上。然而，特朗普上台后，一方面推行制造业回流计划，重新振兴美国的制造业；另一方面，2018 年特朗普政府又挑起了中美贸易摩擦，形式上是关税问题，但实质上则是产业问题，目的是打击中国制造业的升级，因为当时中国正在推行“中国制造 2025”计划。在美国政府看来，中国的这个计划与美国重振制造业存在着严重的对冲。经过多轮谈判，贸易摩擦逐渐缓解，但没有根本解决中美之间的经济问题。2020 年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使全球制造业雪上加霜，尤其是作为制造业产业链中心的中国所受到的冲击更大。全球产业链的重组表现为，一方面是政府以产业安全特别是上升到国家安全的程度来主导产业的回归；另一方面则是跨国公司基于“产业链安全、可控”的考虑，改“外包”为“内包”，把原先分包给外部企业的业务重新收回跨国企业内部（刘志彪等，2020）。另外，经济形态的重大改变，客观上也会对全球产业链进行重组。例如，数字经济是以大数据手段来实现资源的快速优化配置，是借助于云计算、物联

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而实行的“新制造”产业，所以这样的全球产业链将以数据技术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为中心，呈现出辐射状的全球产业链结构，而不是传统产业的链状产业链结构。虽然区块链是去中心化，但数字经济的全球产业链重组过程则是重塑产业中心的过程。

第二，全球供应链中心正在发生转移。由于承接西方工业国家的传统制造业以后，中国在短短的数十年间就逐渐成为传统制造业的全球供应链中心。然而，全球产业中心的转移必然导致全球供应链中心的转移。如前面所说，为了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冲击，西方发达国家迅速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开始力推数字经济这种新的经济形态，目的就是要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这就意味着传统制造业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将大大降低，制造业供应链中心将很快被数字经济供应链中心所取代。这是在疫情冲击之下，经济全球化新态势的最直观、最直接的表现。

第三，全球价值链正在重塑。在传统制造业及其产业链中，全球价值链的形成过程主要受制造业产业链制约。传统制造业中的产品是有形的，在全球分工制造过程中，不仅其制造过程是透明的，价值形成过程也十分清晰。例如，中国工厂出厂的 iPhone 价格是 144 美元，但中国只贡献了其中的 4 美元。其中 100 美元是来自进口的日本的硬盘、显示屏、电池等，15 美元来自进口的美国的内存、处理器等。当然，这也表明长期以来中国主要依赖传统要素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不仅产品附加值低而且缺乏品牌效应，因此中国产业主要集中在全球价值链中低端，主要以“价廉物美”参与市场竞争。然而数字经济时代，数据不仅是全球价值链的重塑手段，也是全球价值链本身的关键环节。这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产品产出“从物质产品形态转变为以比特呈现的数字形态。这一转变的实现路径主要有：一是物质产品直接以数字化的形态呈现，如图书、杂志、报纸从以纸张为载体转变为完全以数字化形态呈现。二是物质产品生产过程的分解，从产品设计方案到最终产品制造完成的价值链中，产品设计方案、产品原型以数字化形态呈现，最终产出仍是物质形态。在投入方面，除了传统的物质形态投入品外，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和价值的重要来源”（李晓华，2022）。这种情形也就是所谓的制造业“服务化”、服务业“自动化”。这两化是全球价值链重塑的最重要的表现形式。

当然，经济全球化的内涵非常复杂，以上三个方面是其最直接、最重要的表现，但其深层则包括经济全球化的实际主导者、规范性的制度，以及支撑经济全球化制度的国际价值等，都在相应地发生变化。不过，本文认为主导者、制度、价值支撑、技术因素是经济全球化变化的前置性因素，因而笔者把这些因素视为导致经济全球化新态势的直接原因。

从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者来看，国际权力转移不断在重塑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者。经济全球化最初虽然表现为资本对外扩张的现象，但实际上也是一个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②然而，20 世纪 70 年代兴起的经济全球化浪潮首先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的

世界范围内的分工所致。美元危机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世界告别了廉价石油时代，这对新科技革命（即第三次工业革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第三次工业革命引发了西方各国的制造业革命，而当时的工业制造业大多是基于廉价石油而打造起来的产业。在能源价格骤升的情况下，美国、欧洲一些发达国家开始进行产业转移，而东西方局势的缓和及冷战结束，进一步加快了世界范围内新一轮产业布局调整和分工。这种情形也导致西方发达国家制造业空心化，造成巨大的就业压力，进而引发社会的反经济全球化浪潮。积怨增长也反映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和传统国家实力的下降，代之而起的是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这演绎了国际权力转移的实质性内容。

从经济全球化的制度供给来看，战后的制度供给也就是全球公共产品的生产，主要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它们提供的方式包括：一是强加，即把本国的价值理念强加于相应的国际组织、国际制度之上，使之成为国际共同“遵循”的价值和规则；二是植入，即将本国的价值理念和有利于本国利益的规则嵌入到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之中；在主导国际规则的前提下，以程序性“协商”而“绑架”国际制度；单边主义地推行相应的规则（胡键，2020）。这些情况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全球经济治理的实质性内容，即主导国家以制度规范的名义实现其最大国际收益。所以新兴经济体要求对此进行改革和创新，这些要求已经改变且还正在改变着经济全球化的制度供给和全球公共产品的生产者。

从经济全球化的价值支撑来看，经济全球化的价值支撑实际上就是全球伦理（戴维·赫尔德、安东尼·麦克格鲁，2004）。那么，是否如众多学者所说的那样当今的经济全球化完全是主权国家追逐利益的结果？如果是的话，那么经济全球化的确就成为只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一种利益进程。那我们如何理解发达国家民众的反经济全球化现象呢？又如何理解广大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全球化的期待以及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所取得的巨大经济发展成效呢？这两种情形的存在意味着经济全球化的确具有普遍获益的客观条件，关键是各国、各民族要善于抓住和利用机会。若如此，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有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伦理来规范经济全球化。尽管经济全球化会引起全球不平等的持续性加剧，但经济全球化本身不是一种具有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手段。此前的西方主导国家的价值被国家的强力嵌入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之中，并被赋予了全球伦理的色彩，但因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扭曲而激起了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在当今虽然也没有形成经济全球化价值的共识，但世界发展所遭遇到的种种挑战，使人们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寻找“最大价值公约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尽管世界各国的分歧很大，但都在努力寻找，一旦这个“最大价值公约数”被找到，那么经济全球化的价值支撑即全球伦理就会实现重大的调整，从而对经济全球化产生重大影响。

从技术变革来看，技术是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推动力；经济全球化反过来也会促进技术新的发展。《共产党宣言》就指出：“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

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2009）。从英国工业革命以来，技术的发展已经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新科技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正方兴未艾，而且全新的技术正强势赋能经济全球化，从而使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广度都是史无前例的。

二、全球经济治理的变革

全球经济治理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产生的世界理性行动，既然经济全球化出现了新态势，那么全球经济治理也必须要相应地进行变革。除了上面所说的经济全球化出现的新态势外，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最关键原因在于世界对全球公共产品的需求与消费“偏好”发生了重大变化。冷战结束以后，无论是国际力量格局还是全球经济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既有的全球公共产品包括最重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WTO）等相当部分的机制出现了“老化”现象，但要创新却又遭遇各种困难，特别是大国的阻力以及制度运行的惯性。因此，众多国家对全球公共产品出现了“消费不足”和拒绝“需求”的现象，这种现象促使全球要理性地对待全球公共产品，尤其是要理性地进行全球经济治理的变革。正是鉴于消费“偏好”的改变，进入21世纪尤其是进入第二个十年以后，公共产品的供给和消费出现了以下一些新情况：

第一，传统的全球经济治理公共产品的功效受到普遍性怀疑。世界贸易组织是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最重要的机构和公共产品，其功能不断“外溢”，覆盖范围不断扩大。中国正是在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才真正融入到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之中的，也正是这时候中国的经济发展规模和质量也都得到了迅速提高。于是，有关“中国搭便车”之说法开始在西方甚嚣尘上。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挑起了对华贸易摩擦，甚至威胁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并采取了种种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包括退出跨太平洋贸易关系协议（TPP），要求重新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等。而与此相反，作为后参与者的中国反而更加强调维护世界贸易组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权威性。于此，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悖论：主导者要求退出，而后来的参与者却积极维护。这与20世纪90年代在西方国家爆发的反经济全球化运动颇为相似，只是当时的反全球化的力量是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而现在以贸易保护主义为内容的反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治理的力量已经变成了美国政府。在这种矛盾之中，全球经济治理的变革就势在必然，但全球经济治理的权威机制不可能短期内被替代。这就意味着要建立类似于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全球性的全球治理机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除非世界秩序处于大动荡之中，在和平与发展依然是世界主题的情况下，此类全球公共产品的更新只能在长期博弈中革新。

第二，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正在取代过去各种区域或跨区域层次的自贸区。区域或跨区域层次的自贸区始于20世纪80年代，然而，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传统的自贸协定退潮，代之而起的是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庞中英、杜海洋，2022）。

例如，2020年11月，东盟10国和澳大利亚、中国、日本、韩国、新西兰5国正式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2021年9月，中国向《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保存方新西兰提交了正式申请加入CPTPP的书面信函；2021年11月，中国向《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保存方新西兰正式提出加入DEPA的申请。另外，早在2012年2月，中欧领导人就启动《中欧投资协定》（BIT）谈判达成共识。2019年11月，在中欧领导人第24轮谈判后，BIT更名为《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这些协定大多数在谈判和审核进程中，有的已经谈妥但也受到各自内部的原因而遭遇到实施的阻力，但不管怎样这都表明，完全依赖于传统全球经济治理机构来进行治理，已经非常不现实了。这些机构不仅自身存在着缺陷，而且在新的世界经济形势下，一系列全新的经济领域和问题都纷纷涌现。因此，“世界经济正在步入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主导的新阶段”，“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也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解决全球经济问题的新的手段（庞中英、杜海洋，2022）。

第三，数字经济等全球经济新兴领域不断出现。数字经济的基础技术平台是互联网、大数据、云平台、区块链等，以及以算法、算力和5G传输技术为工具的新兴经济形态，由此迅速形成了以全球数字产业、全球数字贸易、全球数字货币等内容全新的全球经济治理领域。而“传统的全球治理机制难以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新需求，而新的数字经济治理规则尚未建立或不完善，治理赤字有增无减。为应对这些挑战，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需要进行相应的改革和制度创新，以提供有效的系统性解决方案，使数字技术更好地服务于全球经济发展”（徐秀军、林凯文，2022）。很显然，数字经济在技术发展以及技术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还涉及技术伦理问题，这无疑是全球经济治理的新课题，也是全球经济治理变革最重要的因素。

数字经济的兴起使全球经济治理主体发生重大变化。一个是非主权国家行为体如企业等私人部门，它们掌控着全世界最大规模的数据，是数字经济领域中最重要市场主体，也是全球经济治理最重要的主体。没有这些私人部门的参与，数字经济的秩序会出现无序化。另外，个人也作为行为主体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之中，这是全球经济治理前所未有的新现象。在数字经济时代，“个人开始走向全球数字经济治理舞台的中心”，个体“消费者将从社会生产的相对独立的旁观者变成深度参与者”，最典型的就社交媒体用户、智能手机用户等（陈伟光、钟列炆，2022）。他们是数字经济庞大的主体和消费者，既然数字经济成为世界经济中最重要的经济形态和未来必然的主导性经济模式，那么全球经济治理的变革也必须对个人行为体给予未雨绸缪的关注。

三、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制约因素

全球经济治理变革关键是全球经济治理公共产品的变革，博弈的焦点依然是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规则等公共产品。换言之，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最关键的制约

因素是制度这种公共产品。学术界的确也看到了制度公共产品的关键作用，但大多数是从制度的外部因素来分析制度公共产品变革的。例如，有学者认为制度变迁的困境在于，国际权力结构变化凸显全球治理机构代表性不足，主权民族国家体系造成全球治理机制责任错位，国际机制复杂性引发全球治理政策失灵，全球治理议程扩大显现全球治理体系的盲点，理念分歧与竞争使得全球治理规范缺失（卢静，2014）。也有从制度的内部因素来分析制度变革的动力机制，例如有学者指出制度变革的内部驱动因素，“主要包括行为体的观念、权力和利益的变化”，他们强调观念的变化会引起制度变革；权力配置则表现为“制度的投票权、设计权、解释权和执行权等”；而利益则主要是指利益分配（陈伟光等，2022）。这比单纯从外部力量结构来分析制度变革的原因有了重要的进步，但同时我们要注意：其一，并非观念的任何变化都会导致制度变革，只有当新知识对旧知识根本性替代的时候，才能够促使制度变迁。其二，由投票权、设计权、解释权、执行权等构成的权力配置是制度运行的机制，它们的改变也不一定改变了制度的全貌，而是改变了制度内部的运行机制，这种情形不一定意味着制度变革，而是机制变革。其三，利益分配也是制度内部的运行机制，也不代表制度的全部。换言之，这些的确是制度变革的内部动力因素，但其中任何部分因素的改变不代表制度的革新变革。因此，我们需要理解作为一种契约关系的制度及其构成的根本要素。本文认为，制度构成的根本要素包括：利益、思想、价值。利益是制度的物质基础，这里是指制度本身提供的收益；思想是制度的文化养料，价值是制度的内核。也就是说，要形成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公共产品，一是要满足各方的利益诉求，二是要有一种思想文化氛围为制度公共产品提供思想来源，三是各方必须要有价值共识也即各方在坚持各自价值的前提下要寻找到一个“价值最大公约数”。这三大要素缺一不可。

从利益来看，各方合作必须要有利益，各方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建设或变革无非是这样两种情形：一是既有的公共产品已经无法获得利益了，所以要求重新“签约”；二是在既有公共产品还有一定制度收益的前提下，制度公共产品的效用递减，收益在不断萎缩，为了在制度收益上“止损”，各方也会要求重新“签约”，变革既有的制度公共产品。最终各方是否能够重新“签约”，关键还要看未来收益问题。笔者在另外的文章中研究中美竞合关系时建立了一个模型即“PARTS”（参与者、附加值、规则、战术、范围）的模型，而关键是附加值（Added Values）（胡键，2022）。革新的公共产品所产生的可期待的附加值越多，则重新“签约”的可能性越大；反之，重新“签约”的可能性就越小。因此，在既有的制度下的博弈最终走向重新“签约”而形成了革新的公共产品后，博弈达到了均衡，这个均衡点也是未来收益的起点，更是新的博弈的起点。^③不过，革新的公共产品能产生附加值的大小取决于三大要素，即：贡献（Impact）、亲密（Intimacy）和远景（Vision）（胡键，2022）。在本文所讨论的问题中，贡献就是指在革新了的公共产品框架中各方的合作能够创造出的价值；亲密是指在革新了的公共产品框架各方的相互依赖程度；

远景就是指在革新了的公共产品框架各方未来目标和收益期待。

从思想来看，这里指的是究竟用什么思想来为制度公共产品提供智力支撑和文化养料。公共产品之所以会产生就是基于国家间的合作，所以从“维也纳协调机制”到国际联盟，以及到联合国体系，都是基于合作才创造了相应的公共产品。但是，不同的思想基础之上的合作内容是大相径庭的。“维也纳协调机制”是一种大国协调机制，尽管当时还没有现实主义理论，^④但大国协调所追求的是国家权力，已经具有了权力政治学的现实主义逻辑。到联合国体系的时候，这种公共产品则完全体现了现实主义思想的逻辑，即国际制度公共产品一定是大国主导的，因为只有大国才能担当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在现实主义看来，权力才能产生秩序。不过，这一观点被后来的自由主义学者基欧汉所否定（罗伯特·基欧汉，2001）。国际联盟是基于理想主义而构筑的合作模式，但由于理想主义认为，个人道德标准适用于国家，它所追求的是国家间平等原则，但在无政府状态的世界中基本上无法实现。因此，它遭到了现实主义的驳斥。不过，现实主义之中也有一派观点强调经济上相互依赖而走向合作的可能，即“共同的经济利益导致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的需求”。这就是从现实主义演化而来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罗伯特·基欧汉，2001）。新自由制度主义强调相互依赖基础上的合作，这种合作是指平等的、自由开放下的合作。这样，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开放、产业开放等就受到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质疑。不过，新自由制度主义最初允许一些国家有条件、分步骤地开放，最终达到同等程度的开放。这样在革新了的公共产品平台上是可以维系持久合作的。然而，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环境的改善、产业水平的提高等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实现的，甚至在有的国家很有可能会出现逆转，从而无法履行关于全球经济治理层面的承诺。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就会指责这种“搭便车”现象。结果，制度公共产品的革新就很难实施，既有的全球公共产品也变得无效化。当前全球经济治理的情形就属于此类情形。近年来，建构主义思潮的影响越来越大，建构主义认为人类的关系结构主要由共有观念决定（亚历山大·温特，2000），这种“关系结构”必然也包括合作。建构主义认为无政府状态至少有三种结构，而“属于哪种结构取决于什么样的角色——敌人，竞争对手，还是朋友——在体系中占主导地位”（亚历山大·温特，2000），这三种角色因三种不同的文化观念而分别建构“霍布斯结构、洛克结构和康德结构”（Martin Wight, 1991）。这三种结构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的结构关系：敌人、竞合、长期合作。可见，不同的思想在非常大的程度上影响公共产品的供给。

从价值来看，全球公共产品是在价值共识的基础上形成的，没有价值共识就难以形成公共产品。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已经有一些研究，任剑涛（2004）指出，“全球治理是一个包含着价值基础、规制保证和治理操作三类主要指标的复杂的治理体系”；蔡拓、吴娟（2005）认为，“全球治理体系规则与一定价值取向的社会公共观念、文化、价值观具有一致性，而后者往往是前者获得合法性的基础”。笔者也有文章探讨过这个问题并指出，尽管各国都参与到全球治理之中，但由于对全球

治理价值的认知存在着巨大分歧，从而使全球治理的进程受阻（胡键，2016）。然而，此前都没有探讨在价值差异之下能否走向价值共识和如何实现价值共识的问题。在全球经济治理的价值构建问题上，国内学者大多用恩格斯关于不存在“永恒道德”的观点来反对“普世价值”，而同样借用恩格斯的“共同道德”提出了一个“共同价值”的概念。^⑤然而，既然道德、价值有阶级性，那么即便是“共同价值”也只能是在同样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同一阶级的“共同价值”。这样就无法在世界各国中获得价值共识。但是，笔者认为，价值表达具有民族性、阶级性，而价值的内容有的是超民族、超阶级的。例如，马克思反对资产阶级民主，但马克思所反对的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形式，但并不反对任何阶级包括资产阶级追求作为价值的民主。按照这种逻辑，我们可以认为全世界各国、各民族在价值这个体系大厦中是可以找到本国、本民族“可适用的价值”。于是，在各国、各民族的“可适用的价值”之中，我们便可以寻找“价值最大公约数”。这个“价值最大公约数”就是全球经济治理制度的价值内核。这个内核一旦发生变化，那么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就必然要改变。

四、走向全球经济治理的善治如何可能

何谓善治？这个概念的提出或许与亚里士多德有关，他在《政治学》一书中就指出：“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善业——所有人类的每一种作为，在他们自己看来，其本意总是在求取某一善果。”（亚里士多德，1965）但很显然，亚里士多德的前半句具有理想主义色彩，后半句则强调了“在他们自己看来”是“在求取某一善果”。也就是说，“善治”更多的是一种主观善的认知结果，而非完全是客观的实际。按照康德的说法，“善”本是审美的结果。他认为“善”有两种：一种是“间接的善”，即对客体有益的善；另一种是“直接的善”，也即是主体本身的善（康德，1963）。即便全球经济治理实现了善治，也就是实现了“直接的善”，但由于各国价值的差异必然导致对“直接的善”的认知差异，以及事实上主权国家利益的不一致性，使“直接的善”导致对不同主权国家的“间接的善”的巨大差异。在这种情形下，世界就非常有必要确定“间接的善”的相对统一的标准，确定某一个阶段内的全球经济治理达到善治的目标，然后来分析影响该阶段内全球经济善治的主要因素。

关于全球经济治理的善治标准，迄今为止学术界对此似乎没有直接的研究，所以笔者在这里完全是从自己的观察主观性地认为它应该包括这样一些内容：其一，全球经济治理制度的公正性，也就是说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必须要摆脱大国主导的情形。只要是在大国主导下的公共产品，那就存在着不公正的可能性。制度公正正是全球经济治理走向善治的前提。其二，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之中，各行为主体能够从体系中获得持续性的收益，从而体现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共赢性原则。其三，各主权国家国内制度与全球治理制度始终保持协调性。全球经济治理既是对全球经济

问题的治理，也是对全球权力的分配，所以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也反映了国家实力对全球经济权力层面的分配的重要影响。当然，主权国家行为体在这方面要进行两种制度的协调，一方面要把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内化为其内部治理的重要参考因素；另一方面也要努力把内部成功的治理制度外溢为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这样就可以两全其美。其四，全球经济治理要促进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全球经济治理归根到底是全球发展治理，确切地说，可持续发展问题是 21 世纪全球经济治理的关键问题。这方面的标准应该可以转化为具体的指标来分析，但遗憾的是由于它比较复杂，笔者尚未对这个标准进行指标化研究，期待另外专门研究。从上述标准来看，我们可以简化为一个词来表达就是：世界发展的包容性。

关于全球经济治理善治的目标，全球经济治理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目标，但每一个阶段的目标不管什么内容，都有一个关键词，即：可持续发展。例如，1987 年联合国发布的《我们共同的未来》，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 世纪议程》，表明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的共识；2012 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一致通过了《我们憧憬的未来》，为制定《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了蓝本；2015 年，联合国发展峰会正式制定了《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定了包括消除贫困、饥饿、健康生活、公平教育、性别平等、水和环境的可持续管理、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等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这无疑是全球经济治理必然的目标。但当前影响实现这个目标的因素似乎越来越多，未来可持续发展具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这也是全球经济治理遭遇的最大困境。当前最直接的因素表现如下：

第一，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有种观点认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被用作国内政治纷争的工具反对全球化，因为，“一些国家的政党用政治诉求绑架疫情的应对，将全球化导致新冠肺炎疫情的扩散作为逆全球化的理由，认为疫情之所以在全球蔓延，是由于各国之间人员流动等交流太频繁造成的，将全球化进程中的政策失误作为政治攻击的手段，试图用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迫使政治对手就范，采取限制人员流动、限制货物流动等作为应对疫情大扩散的手段”（郭泽林、陈琪，2020）。不过，作者并没有具体的案例提供，而只是一种主观判断。从这次疫情流行的三年来看，这种情况几乎没有，反而是我们看到了一个事实，新冠肺炎疫情的确是改变了经济全球化的内容，也导致全球价值链、供应链等的重塑，简言之，“传统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正在遭到冲击”（李晓、陈煜，2020）。因此，全球经济治理的主体需要考虑后疫情时代在新的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之下应该创新合作模式；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和相关的公共产品更要进行新的调适，以适应这些新的情况和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第二，“非对称性战争”的影响。进入 21 世纪以后，局部性的战争已经发生多次，“9·11”事件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一个重要的现象是，“非对称性战争”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在影响着世界，如恐怖主义与反恐怖主义的战争（这是当

年被美国定义“非对称性战争”的重要依据)、人类与病毒的“战争”(这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出现的情况)等。乌克兰战争表现出新的“非对称性”,笔者认为这是一场元宇宙时代不同“维”的战争,一方处于传统战争技术条件下以传统作战理念为指导战争行为,另一方则是通过各种加密技术而展开全新的网络信息战争的行为。尽管大量文章认为西方把俄罗斯踢出国际资金清算系统(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 SWIFT)会引发全球经济治理的大动荡,特别是俄罗斯强调在能源出口“以卢布结算”作为反击,从而导致国际金融系统的混乱和崩溃。然而,我们不能高估卢布在国际资金清算系统中的地位,毕竟卢布还不能自由兑换。换言之,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不会对全球经济治理造成大的负面影响,而主要是对俄罗斯经济具有比较大的压力。不过,当前,上述三种类型的“非对称性战争”交织在一起,将持续冲击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第三,大国关系的新变化对全球经济治理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当前大国关系的一种重要特征是以“全面性”的经济地区主义表现出来,就正如前面所说的CPTPP、RCEP等,这些地区主义机制不再像传统的地区主义机制那样被大国所主导,而经济合作的色彩更加浓厚,因而在这样的地区主义机制中关键看经济影响力,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国或地区大国。不过,有的经济地区主义其战略色彩特别强,例如2021年1月美国宣布启动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其主要内容是贸易便利化、数字经济标准和技术、供应链韧性、脱碳化和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劳工标准等。其中重塑全球供应链是其重要目标。弹性供应链是IPEF的四大支柱之一,而这个弹性供应链是基于一个供应链预警系统,目的是确保关键性原材料、半导体、关键矿物和清洁能源技术可持续获得,提高关键领域的可溯源性(traceability)。这样既可以确保知识产权的保护,也可以进行有效协调。这个弹性供应链是“去中心化”,也就是供应链中心“多元化”(diversification)。这非常明显就是针对全球供应链中心——中国,目的就是要“去中国化”,进而实现对中国的战略遏制。美国总统拜登宣布正式启动“印太经济框架”后,便对外公布了成员名单,一共13个国家,除美国外,日韩澳新印也在列,东盟仅3国没有加入,分别是柬埔寨、老挝和缅甸。这些国家大都属于中国周边国家,而且是中国过去40多年对外开放的主要对象国,与中国经贸关系密切,相互依赖程度非常高,在利益上相互嵌入度也非常深。可见,美国此举目的就是要打破这些国家与中国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嵌入格局,通过重组全球供应链的方式彻底把中国孤立于全球经济体系之外。

既然如此,全球经济治理该如何走向善治?前文述及,既然全球经济治理走向善治关涉的是全球公共产品的公正性、全球经济治理的持续收益性、行为主体的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制度的协调性问题,那么全球经济治理走向善治就首先是要解决这三大顶层性问题。至于上述三个对全球经济治理变革影响的直接因素,当顶层问题能够顺利解决,则直接影响因素就可以迎刃而解。不过,当前形势之下,提出解决顶层问题的任何措施都只能是基于“应然”逻辑。其一,在公正性的问题上,国

际道义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中是否还有意义？假若国际道义依然是国际社会的重要坚守，那么全球经济治理中公共产品的改革和创新都要坚守公正的原则。不过，我也不主张甚至不赞同有“道义现实主义”一说。^⑥因为，它强调“政治领导力决定大国实力对比转变及国际体系的类变”（阎学通，2014），但没有实力的政治领导力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只是表现为一种影响力，即一种软实力而不是领导力，这样的领导力在国际关系史上几乎找不到案例。众所周知，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但全球的贫富鸿沟依然巨大，而全球经济治理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依然是大国，假若大国能够秉持国际道义，通过全球公共产品来弥合这种贫富鸿沟，则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世界的贫富分化问题。其二，在全球经济治理的持续性收益问题上，实际上也是全球经济治理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应该坚持“包容性发展”。^⑦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国的经济政策与发展方式必然会深刻地影响其他国家。共享发展机遇，实现互利共赢，是世界各国必然要面临的一大选题。这就是包容性发展的实质”（张幼文，2011）。换言之，国家追求单方面利益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是不可持续的。其三，在内部治理制度与全球经济治理制度的协调性问题上，应该处理好“内化”与“外溢”的关系。一方面，主权国家对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内化”是主权国家的内部需求所致，而不是外在压力所致；另一方面，内部治理制度的“外溢”是内部治理制度的科学化和外部的期待所致，若主动把内部治理制度强加于全球经济治理过程，其结果必然是全球经济治理制度重新变成服务于一国利益的“私物化”产品。

结语

进入21世纪以后，世界大变局与经济全球化出现了诸多的互动，而中美贸易争端、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国际权力的转移等，都直接助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新态势，如全球产业链、全球价值链、全球供应链等都在重组、重塑、重构。全球经济治理也必须进行变革，不仅体现在治理主体的变化，而且也包括相关的公共产品的改革、创新，以便更适应全球经济出现的众多新兴领域，从而力图避免全球经济治理的无效性。全球经济治理的变革最为关键的制约因素是制度公共产品的改革和创新问题。制度构成的根本要素是利益、思想和价值，即制度是否可以提供预期的收益、制度是以什么思想为导向、支撑制度的价值是什么。除此之外，还有一系列的直接因素也会成为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重要掣肘，如新冠肺炎疫情、“非对称性战争”、大国关系新的结构性变化等。

当然，尽管全球经济治理变革面临诸多困惑，受众多因素的影响，但全球经济治理走向善治也并非不可能。全球公共产品的公正性、全球经济治理的持续收益性、行为主体的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制度的协调性问题，这是全球经济治理进程中的三大顶层性问题。如果能够顺利地解决这三大问题，那么全球经济治理就有可能走向全球善治。

（通讯作者 胡键电子邮箱：13918273121@126.com）

注释：

- ① 关于“异类文明”的概念是笔者提出来的,参见胡键:《全球化的时间与空间: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思考》,《国外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第40页。
- ② 这个观点源自于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重要判断,即“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就是经济全球化资本主导的一面,但在前面他们又说:“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着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这就是经济全球化客观趋势的一面。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 ③ 这是新制度主义关于制度变迁的观点,实际上,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变迁与国内经济制度变迁的原理有非常大的相似之处。参见青木昌彦:《沿着均衡点演进的制度变迁》,载科斯、威廉姆森等著:《制度、契约与组织——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的透视》,刘刚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24页。
- ④ 现实主义理论是作为对理想主义的“空想”特征的一种反击而出现的,它产生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完善于二战后。主要标志是爱德华·卡尔的《二十年危机》和汉斯·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参见王逸舟著:《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1-62页。
- ⑤ 值得注意的是,莱布尼茨认为,数学上是“共同”而哲学上则是“永恒”,二者在意义上是一样的。参见莱布尼茨著:《人类理智新论》,陈修斋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页。
- ⑥ “道义现实主义”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张峰教授提出来的。参见Zhang Fen, “The Tsinghua Approach and the Inception of Chinese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5, No. 1, Spring, 2012, pp. 95-96。
- ⑦ “包容性发展”的概念始于2007年亚洲开发银行提出的“包容性增长”。不过,“包容性增长”是指一个国家内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要兼顾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进步目标。从那时开始,增长的包容性问题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参考文献：

- 蔡拓,吴娟,2005. 试析全球治理的合法性[J]. 教学与研究(4):35.
- 陈伟光,刘彬,2020. 理性认知经济全球化与全球经济治理[J]. 社会科学(7):25.
- 陈伟光,刘彬,聂世坤,2022. 融合还是分立: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变迁的逻辑[J]. 东北亚论坛(3):33.37.
- 陈伟光,钟列炀,2022. 全球数字经济治理:要素构成、机制分析与难点突破[J]. 国际经济评论(2):70.
- 戴维·赫尔德,安东尼·麦克格鲁,2004. 全球化与反全球化[M]. 陈志刚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80.
- 郭泽林,陈琪,2020.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影响研究[J]. 经济体制改革(6):32.
- 胡键,2016. 全球治理的价值问题研究[J]. 社会科学(10):3-15.
- 胡键,2020. “一带一路”的国际公共产品功能与中国的软实力提升[J]. 国外社会科学(3):5-6.
- 胡键,2022. 中美竞合关系——从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何以可能? [J]. 国际观察(1):59.69.
- 康德,1963. 判断力批判(上卷)[M]. 宗白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45.
- 李晓,陈煜,2020. 疫情冲击下的世界经济与中国对策[J]. 东北亚论坛(3):52.
- 李晓华,2022. 数字科技、制造业新形态与全球产业链格局重塑[J]. 东南学术(2):135.
- 刘志彪,姚志勇,吴乐珍,2020. 巩固中国在全球产业链重组过程中的分工地位研究[J]. 经济学家(11):53.
- 卢静,2014. 当前全球治理的制度困境及其改革[J]. 外交评论(1):107-121.
- 罗伯特·基欧汉,2001. 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M]. 苏长和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6-8.
- 马克思,恩格斯,200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32.
- 庞中英,杜海洋,2022. 区域或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趋势[J].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122-131.
- 任剑涛,2004. 在一致与歧见之间——全球治理的价值共识问题[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5.
- 徐秀军,林凯文,2022. 数字时代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与中国策略[J]. 国际问题研究(2):87.

- 亚里士多德,1965. 政治学[M]. 吴寿彭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3.
- 亚历山大·温特,2000.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 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314.
- 阎学通,2014. 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J]. 国际问题研究(5):102.
- 张幼文,2011. 包容性发展:世界共享繁荣之道[J]. 求是(11):52.
- Martin Wight. 1991. "The Three Traditions of International Theory" G. Wight and B. Porter, eds.,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Three Traditions[M].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pp. 7-24.

The New Tre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Reform of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HU Jian

Abstract: The new tre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s manifested in the reorganization of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global value chain and the reshaping of global supply chain.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the effectiveness of traditional public goods of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has been widely doubted, the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is replacing free trade zones at various regional or cross – regional levels in the past and the new areas of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are emerging. Therefore,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is bound to undergo new reform with the new change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However, the reform of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is restricted by many factors and it is difficult to move forward. If we start with the top – level behavior problems of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that is, we solve the problems of the fairness of global public goods, the sustainable profitability of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and the coordination of internal governance and external governance of the actors first, other specific problems can be easily tackled. Although there are many difficulties in the reform of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the possibility of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moving towards good governance still exists from an idealistic point of view.

Key word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great changes in the world; global good governance

(责任编辑 扬帆)